

走入「夢幻博物城」 ——日本時代 臺北城建築概述

Come into “Musemble City”-
Overview Taipei City Architectur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凌宗魁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Lin, Tzung-Kuei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公共建築做為意識形態象徵的時代—— 風格與形式的選擇及操作意涵

整個十九世紀的建築主流，西方建築樣式的風格發展進入了停滯狀態，過去曾經出現的仿羅馬、哥德、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各種流行、主義、思潮，成為不同空間機能需求與意識形態任意挪用的百寶箱，這段時間的各種建築風格，包括哥德復興、新巴洛克、新古典等，可以概括統稱為歷史主義（Revivalism）。

當時要做個稱職的建築師，必須熟稔歷史上所有經典建築風格的象徵並能隨意運用。要建造大學和博物館，就使用象徵思辨與知識，讓人聯想到輝煌文明的希臘三角山形牆（圖1）；要建造法院與議會，就使用源於宗教聚會需求，發展自教堂建築的穹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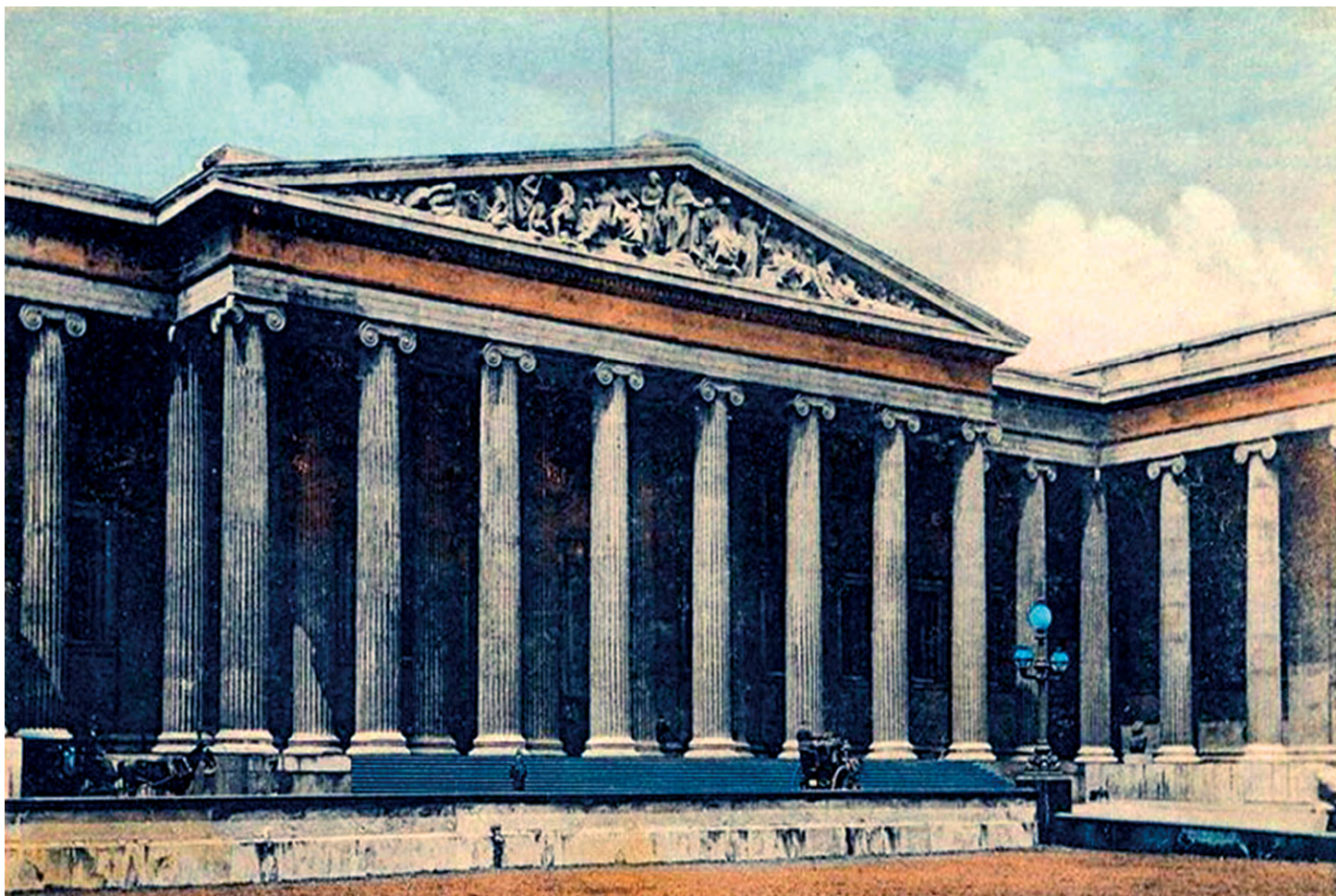


圖1 大英博物館風格取法希臘神殿形象，成為博物館建築範型

構造(圖2);要建造警務與刑務設施,就使用有碉樓與雉堞,森嚴肅穆的中世紀城堡造型(圖3);要建造銀行等金融機構,就使用穩重有秩序,讓人對經濟體系安心的連排巨大立柱;要建造政府廳舍,就使用理性與和諧的文藝復興風格。

建築風格當然也與政治和國族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若是支持英國國教,就使用最能象徵中世紀英格蘭輝煌歷史的都鐸時期哥德式;若是延伸自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殖民勢力,就使用發源自波旁王朝的馬薩式屋頂(圖4);若是想要彰顯教廷及天主教的榮耀,就使用基於激昂情感產生動感表現手法的巴洛克風格。建築師光是要把這些源流脈絡錯綜複雜的風格樣式爛熟於心,還要能得心應手的運用於不同需求的機能象徵,就要耗費其一生專業養成教育與職業生涯。

十九世紀的國際局勢,以歐洲民族國家在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後,憑藉軍事與經濟實力將勢力推展至全世界為重點。亞洲、非洲等大陸到太平洋上的某座小島,都變成歐洲國家延伸權力擴張的新版圖,這些在歐洲大陸上發展至純熟,各自代表定型用途的建築風格樣式,也隨著來自帝國的教會、政權及商業勢力,在全世界蔓延發展。而日本時代的臺灣,正處於這樣時代背景下,被權力支配者塑造城鄉建築樣貌。在政權中心的臺北城中,更是如同一座露天大型博物城,做為彰顯權力表徵而集各種建築風格樣式大成的區域,臺灣博物館位於區域核心地帶,在館舍落成一百周年之際,正是探索此一建築脈絡的適合時機。

本展名為「夢幻」,歷史背景卻並不甜美,而是因為透過建造特定建築形式及運用其樣式風格來傳達政權力量的訊息,以及官方治理範圍和對各地控制的有效程度,這樣的時代已經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過去了。帝國主義時代權力者建造公共建築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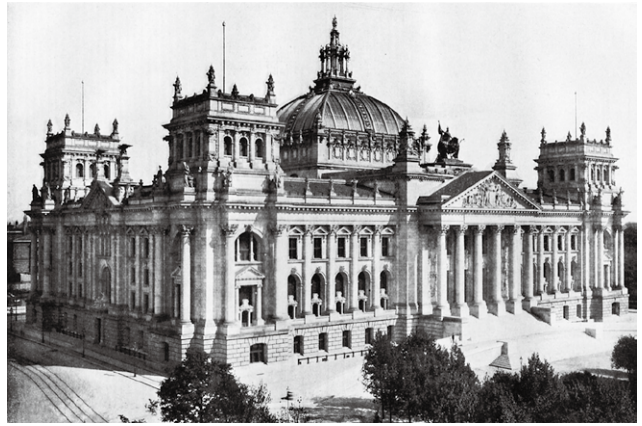


圖2 德國國會改建後仍重建穹頂,做為代議政治制度象徵延續至今



圖3 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士滿比監獄,採用歐洲中世紀城堡風格



圖4 越南河內大劇院的法國第二帝國建築樣式來自殖民版圖勢力擴張

聚認同,象徵著榮耀與力量,但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成本,戰後百廢待舉,全世界從一片

荒蕪的廢墟中奮力重建，在戰前原本源自少數厭倦歷史主義，將其視為陳腔濫調的新銳藝術家與建築家推動的現代主義風格，因其理性與經濟的材料與空間建構特性而襲捲全球，成為今日世界各地最常見的城鄉風貌。因此日本在臺灣投入最多建設資源，建造最多中央官方廳舍的明治末年到昭和初年，是一個已經不復再現的年代，只留下令現代人感到如同夢境般的堂皇巨構，至於是美夢還是噩夢，也不是可以簡單講清楚的。

臺北舊城接續歷史時空的軌跡——從穹頂到高塔的城市權力空間建構

比較各座戰前日本對本土及各勢力所及領土的都城核心區域規劃，臺北所遺留的治理意念，完整的如同時空凍結般保存，即便經過空襲摧殘，大多數官方重要建築及街廓也都還留其形貌，甚至繼續使用。東京的首都計畫從一開始就因計劃過於龐大沒有完成，又因關東大地震、東京大空襲等天災人禍促使許多官方建築改建(圖5)，如今僅存的戰前大型廳舍僅有國會議事堂、司法省廳舍等少數作品。首

爾戰前名為京城，建立於李氏朝鮮已發展五百年的都城漢城之上，都市計畫難以完全抹滅前朝紋理，大多官方廳舍又在戰後陸續被韓國當局拆除所剩無幾(圖6)。今日中國吉林長春，戰前為滿洲國首都新京，國都計畫《大新京都市計劃》規模達兩百平方公里，建築宏偉壯觀，至今仍多為各政府機構延用，但整體計畫亦未完全實現即改朝換代，僅完成八十平方公里。

與上述案例相較，臺北在清末建城，擇址於幾近空地的大稻埕與艋舺市街之間，經營數年初具輪廓即進入日本時代，多數清代遺留衙署建築在日本時代早期仍由各單位所延用，如使用欽差行臺的總督府(圖7)、使用文廟的衛戍醫院(圖8)、使用協臺衙門的臺北監獄、使用大天后宮的總督府醫學校等，現代的官僚組織和官員的西式服裝在漢式群落中活動著，官方的表情，似乎還不能藉由象徵「文明開化」的西洋風貌表現。

隨著治安和財政等條件逐漸步上軌道，總督府建構治理表情的藍圖也逐漸被落實，各種延續自歐洲及其延伸領土，發展多年的建築風格象徵，開始在



圖5 東京中央區銀座座遷省廳舍毀於關東大地震



圖6 朝鮮總督府設計者Georg de Lalande過世後，由臺灣博物館設計者野村一郎擔任建築顧問接續完成，戰後曾做為國立中央博物館，1995年拆除



圖7 臺灣總督府原為清代欽差行臺，使用至1919年才遷入新落成廳舍



圖8 搬遷中的衛戍醫院軍吏室，沿用清代文廟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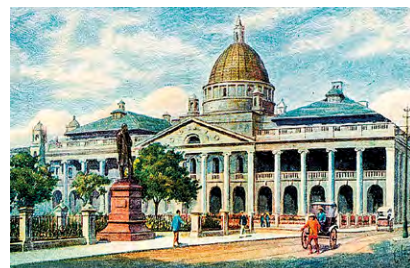


圖9 香港最高法院以穹頂做為維多利亞港最醒目地標



圖10 新加坡最高法院以穹頂主宰政府辦公建築群



圖11 臺灣博物館以穹頂做為表町通視覺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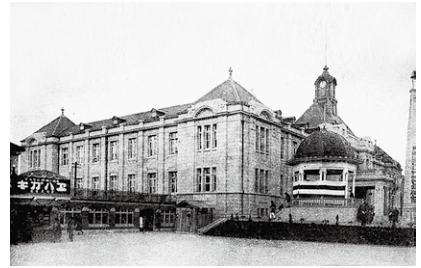


圖12 山形縣廳舍以急斜屋頂搭配小塔樓的設計手法與新竹火車站類似

臺北城內鋪展開來。運用穹頂的臺灣博物館，即為典型案例，穹頂在西方建築文化史中的意涵豐富，殖民宗主國時常將最初做為宗教象徵的穹頂，轉變為政治和經濟權威的象徵，如英國政府在新德里興建的印度總督府、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法院（圖9）、（圖10），以及蘇格蘭商人創辦的匯豐銀行在上海外灘和香港皇后大道的行辦等，皆可視為臺灣博物館建築原型脈絡的同類作品。

以紀念總督與民政長官為名而建造的臺灣博物館，做為日本帝國的統治紀念碑，除了延續自大英博物館以來，運用希臘神殿中俗稱山形牆的三角楣及立柱造型，象徵啟蒙時代以來博物館做為知識典藏與教育推廣科學理性的選擇以外，最主要的空間意象元素，就是中軸線上主導城市天際線的穹頂。座落於臺北大天后宮舊址北側的仿石造紀念館，重要的區位選擇因素，即為使步出臺北車站的旅客，一出站即可望見表町通（今館前路）端點，做為街道底端的巍峨穹頂（圖11），對於致力強化文明形象的治理當局而言，具有顯著的城市意象塑造功能。

除了穹頂之外，塔樓的運用也是強化統治象徵的另一象徵利器。文藝復興以來，建築因疊砌構造方式而發展出各種強調修飾水平向度的語彙排列美感，



圖13 長野縣廳舍塔樓殘存擬洋風趣味



圖14 臺北醫院僅遠望才能觀察中央塔樓全貌

一反中世紀哥德式崇敬上帝強調垂直的量體線條，因此歷史主義時期古典系統的西洋風格建築，

即便使用塔樓做為中軸線上的地標性象徵，也多為畫龍點睛的點綴式運用。

此種西洋風格的塔樓矗立在日本農舍、町屋及長屋等傳統地景中，稍微突出就能達到鶴立雞群的效果，如山形縣廳舍（山形縣鄉土館「文翔館」，圖12）、長野縣廳舍（長野縣自治研修所，圖13）等作品。這個原則拿到臺灣以傳統合院為主所構成的地景中也適用，在臺北可見到如臺北醫院（臺大醫院西址舊館，圖14）和建成小學校（臺北當代藝術館，圖15）等典型案例。



圖15 建成小學校的塔樓小巧，僅具裝飾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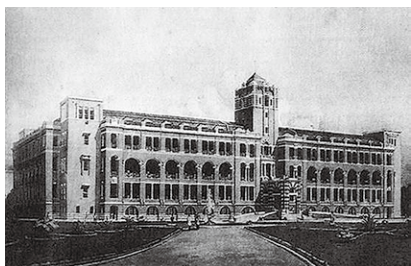


圖16 臺灣總督府長野宇平治競圖獲選方案，塔樓高度為歷史主義樣式合理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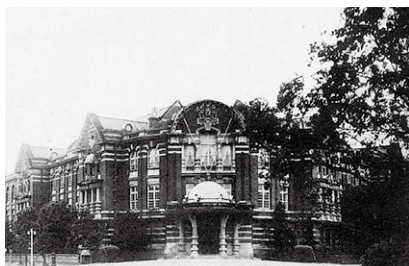


圖17 總督府專賣局廳舍尚未建造塔樓即啟用，後來選擇把塔樓建完的象徵性意圖強烈



圖18 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的外觀風格介於裝飾藝術與現代主義之間，但空間形式與整體配置仍屬於古典系統的歷史主義



圖19 東京大藏省專賣局廳舍，空間機能考量大於象徵意義建構

日本當局在臺灣最高權力的實體象徵臺灣總督府新廳舍，在最初得到競圖最佳方案(乙賞)的長野宇平治的設計(圖16)中，原本也僅為裝飾點綴的中央塔樓，然而在也有參與競圖而未獲選的總督府技師森山松之助，將設計圖帶回日本審查修改後，一舉將塔樓拉高到六十公尺，塔樓高度幾乎達到正立面的一半，一躍成為主視覺最強烈的構成元素。此一超出正常比例的安排，不但在日本國內同時期的建築不曾出現，在其他殖民地和政權影響所及之領土也不常見，當時的建築專業者希望用這樣特殊出格的設計手法傳遞怎樣的意念呢？

又如南門外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即已完成主體建築並啟用(圖17)，但直到1922年才完成幾乎沒有內部實際空間機能而僅為象徵的中央塔樓，成為在城內即可遠望的地標性建築，強化獨佔市場的專賣事業，做為治理重要

經濟政策意象的企圖十分明顯。即便是到了十幾年後完成的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圖18)，接近現代主義的簡潔風格，仍未放棄中央塔樓的量體感，這種強調權力象徵的設計手法意圖，就連在東京的大藏省專賣局廳舍也未如此明顯。

既然外觀造型的主要功能在於權力象徵，日本時代建築家在運用各種西方歷史主義的風格時，對其外觀所象徵的建築意涵琢磨便很精準到位。十九世紀美國著名雕塑家及藝評家霍雷肖·格里諾(Horatio Greenough)，對於新大

陸建築師去脈絡化的搬抄歐洲建築風格皮層，而不深究其內涵深惡痛絕，他認為拿雅典神廟的山牆去裝飾工廠的外觀是對於風格的褻瀆，並早於沙利文(Louis Sullivan)提出形式必須符合建築功能，而非可以隨意挪用的理論，很長一段時間被美國建築師奉為圭臬。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建築專業者，在御僱建築家孔德(Josiah Conder)擬定的教育方針下也深知此理，選擇建築風格時除了理所當然的美感考量，符合機能象徵的形式選擇意義同樣不可或缺。

以森山松之助的四件官廳屋頂為例，臺北、臺中、臺南三廳廳舍，做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機構，皆採用來自法國的馬薩式屋頂，儘管只是整體造型的裝飾，也以高聳屋頂做為民眾仰望的地標(圖20)。但同時期所建，規模亦相近，入口同樣位於



圖20 臺北廳廳舍的造型，借用象徵帝權高漲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所流行之馬薩式屋頂

路口轉角的對稱配置，亦同樣設雙衛塔增添官方威嚴的總督府鐵道部(圖21)，卻使用角度相較平緩的單斜頂，而非複折屋架的馬薩式屋頂。或可推斷森山考量鐵路源自英國，選擇英國式而非法國式的屋頂做法與之呼應，也將綜合性行政官廳與專業技術機構的建築表情做出區隔。

然而除了純粹來自西洋脈絡的延伸與轉化，隨著時局步入「東方」與「西方」文明對抗命題的大東亞戰爭，從明治維新以來全盤向西方國家學習外在技術、工商產業等形象，與內在組織、制度及現代化觀念的國策，與戰爭時期所建構的交戰敵方形象重疊，建築家必須回到傳統東方文化中擷取設計素材，創造出符合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築表徵，在臺北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即為總督府營繕課長井手薰主導設計的總督府高等法院(司法大廈，圖22)。法院最為顯著的中央八邊型塔

樓，在鋼架屋頂外塑造出略帶東方傳統建築狀似轎頂(盔頂)的外凸曲面，予人軍國主義的聯想。

然而臺灣古蹟界的前輩林衡道觀察，認為設計者井手薰的靈感來自於艋舺龍山寺的鐘鼓樓(圖23)，因為日本同時期其他地方的帝冠式建築案例從未出現過這樣的轎頂，而是如滿洲國國務院(吉林大學基礎醫學院，圖24)般的內凹曲面，此案或許可以做為由外而內的單向移植之外，本土建築元素亦成為治理者呼應政策與意識形態的運用素材，如此雙向進行的文化交流案例。

身影逐漸隱沒的城內常民生活空間—— 臺灣獨特的街道商店住宅

在「夢幻博物城」的策展過程中，要挑選哪些案例介紹給觀眾，是策展團隊需多方考量的挑戰。目前



圖21 總督府鐵道部採用英國式單斜頂，與源自英國的鐵道工業相呼應



圖22 總督府高等法院的塔樓屋頂，並非為典型興亞式的內凹曲面線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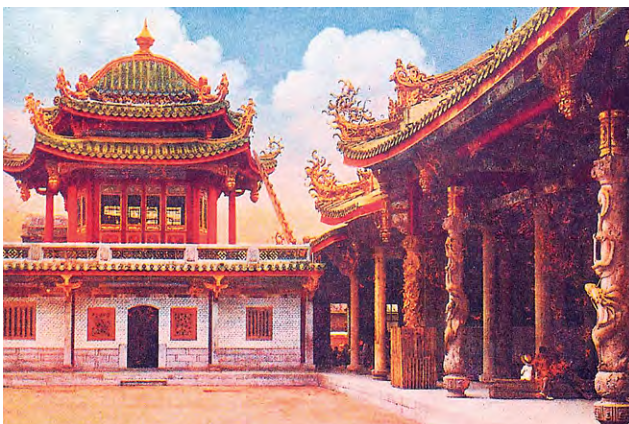


圖23 艋舺龍山寺鐘鼓樓向外微凸的「轎頂」，可在中國岳陽樓、張飛廟等傳統建築中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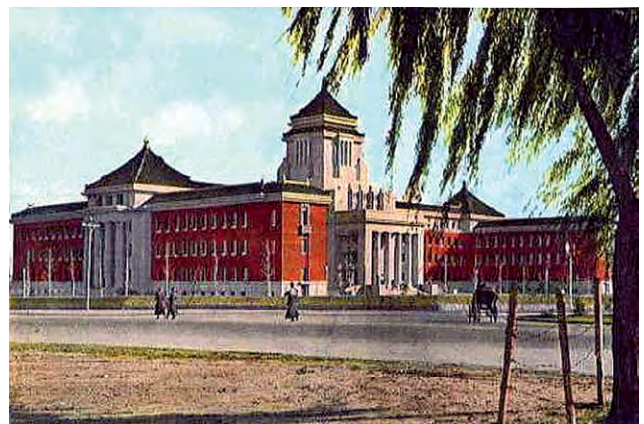


圖24 滿洲國國務院由石井達郎設計，延續伊東忠太及佐野利器的風格理念，屋頂造型屬於典型興亞式風格

現存於臺北城內外的建築，公部門廳舍如前述的博物館、臺北醫院、總督府及法院等，多為日本時代建造並使用至今，但這並不是構成現代化時期的空間全貌，而只反映了官方表徵的面貌。1922年新設町名以後，臺北城內可用街廓區分出明顯的機能劃分。由東側開始的明石町內多為臺北醫院用地；往南的文武町則是總督府、總督官邸、新公園、學校的廳舍和官舍；西南的書院町及乃木町內包法務和軍方用地；而西北側的表町、本町、京町、大和町和榮町，則是商業繁榮的常民市街。

雖然展覽中有一主題「現代大街」，約略說明臺北城內做為全臺牌樓式店屋（街屋）空間型態始祖的表町通、本町通和榮町通，但由於這些建築的產權人，多為戰後被遣返回日本的一般民眾，戰後入住者在缺乏由上而下的政治力規範統合區域內街道風貌的前提下，歷經數十年幾乎將其拆除殆盡，是故常民

生活的現代化痕跡，就像隱沒入歷史的斷簡殘篇，僅能透過零星殘存的些許痕跡填充想像。

日本人在臺灣的建築經驗，除了官方建築延續歐洲脈絡的風格形式，許多包括材料、技術和工法等實質內涵，皆為在殖民地的創新嘗試，而未曾在本國內有系統推行過。在空間型態方面，除了因應氣候需求的陽臺與騎樓以外，被臺灣人稱為「牌樓厝」的長條形店屋法制化可列為其一。

日本內地的商家大多以傳統的斜屋頂面對街道，偶有明治維新西化以後的影響，也大多數是獨棟作品，未形成如歐洲城市全區規劃的各棟等距立面。而整體更新的洋風街道如東京丸之內金融街（圖25）、銀座赤煉瓦街等建築型態各異，皆非如華南至南洋一帶流行長條形並排、各自展現立面風格的空間模式，直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由今和次郎等人發起「バラック裝飾社」推行的看板建築運動，創造出如劇場效



圖25 東京丸之內金融區行辦建築形式移植自同時期的倫敦，與臺灣西洋式店屋大相徑庭，圖中為三菱四號館，由曾禰達藏主導設計

果的連棟店屋，美學流行則已逐漸從官方正統的古典風格，轉變至帶有民間折衷趣味的裝飾藝術樣式。

但在臺北城內，早在進行包含新建店屋的市區改正時，就將正統西洋建築語彙的立面安裝在合乎臺灣氣候，帶有「亭仔腳」的華南式店屋空間，提供日本商人承租，日人再建造合乎日本人生活習慣的日



圖27 1911年風災造成臺北城內淹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乘馬車巡視災情，後方洋樓為臺灣鐵道飯店

本式木造住宅於其後(圖26)，這種建築風格與空間的社會型態組合為臺灣所獨有，並且被來自全臺各地的匠師模仿，將流行擴散開來。

1911年接連四次颱風，造成臺北城內街道店鋪建築嚴重毀損，許多土壁構造浸泡在水中不堪使用(圖27)，為政府大幅降低土地徵收的複雜度，創造徹底更新市街的機會。曾於任內建置北投公園的臺北廳長井村大吉，趁此機會實行市區改正計畫，將城內打造為示範店屋的展示點。

根據曾任鐵道部囑託的建築家松崎萬長回憶，最初改造的府前街(表町通，今館前路)與府後街(本町通，今重慶南路一段)等路段，分別由八位總督府轄下各單位建築技師，分配設計以英國古典風格為主軸的磚造西洋歷史主義風格外觀，立面寬窄基本上固定，但也會根據與街道關係彈性調整，並搭配以法規保留符合東南亞氣候特色的騎樓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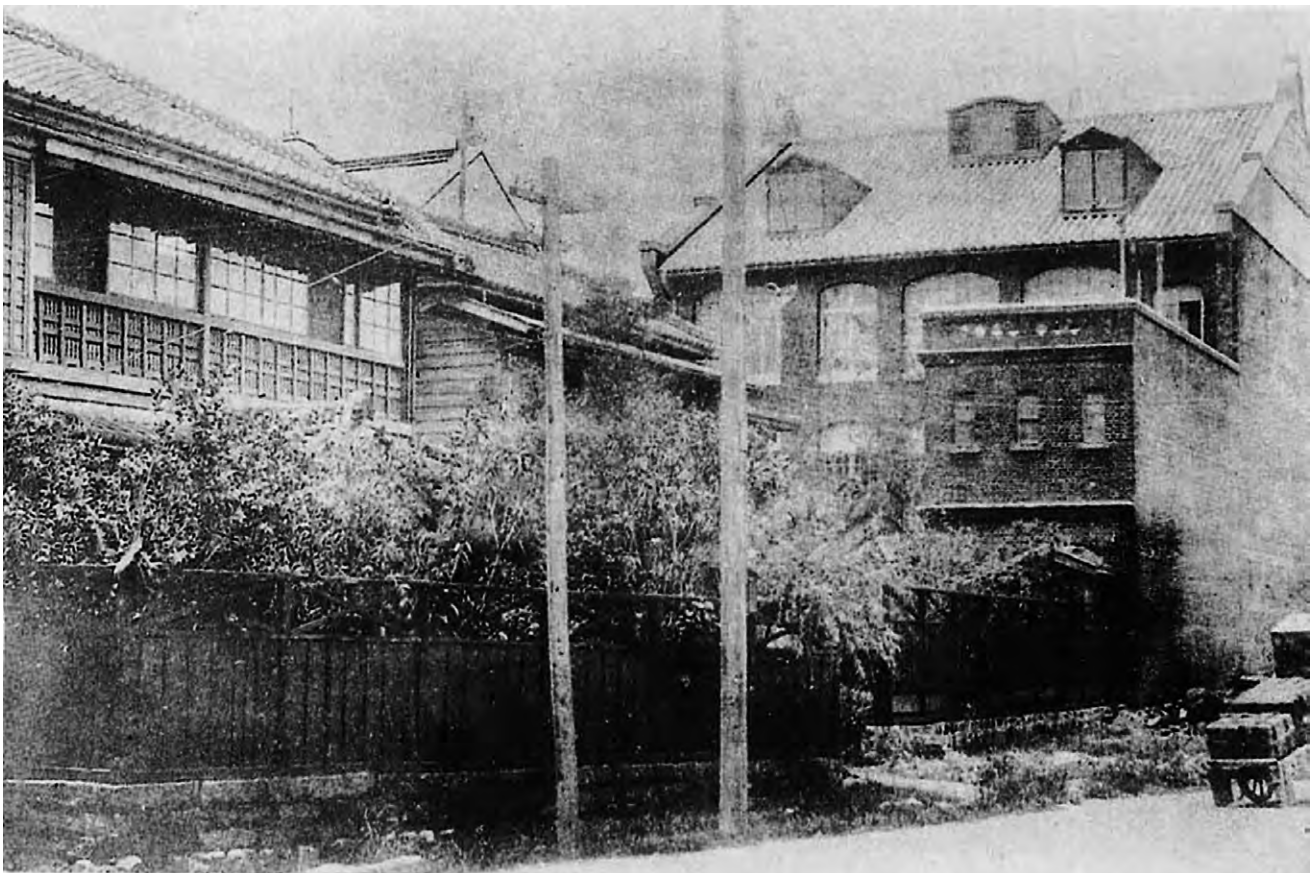


圖26 臺北城內街廓構成，臨街外側為華南式店屋，包覆內側日式町屋，為臺灣獨有的城市紋理，本圖位於府中街一丁目

翻新後絕大多數增建為二至三層樓，提供更多商業空間，是官方由上而下，採取區域集體規劃，「先創造空間再招商」，吸引內地日本人來臺的發展邏輯，將臺北城內的建築風貌以多元文化混合，於1914年大功告成，次年出版《臺北市區改築紀念寫真帖》宣傳政績以茲記錄。

店屋的經營者也可能更換，如今日重慶南路上的金石堂書店，曾經做為餐廳，也曾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攝影器材專賣店西尾商店（圖28）。店主西尾靜夫原為資生堂員工，當時的商店種類少，資生堂除了



圖28 1923年皇太子裕仁親王行啟巡臺，馬車經過臺北本町通（重慶南路一段），後方轉角店屋為西尾商店

化妝品，也兼賣藥品和攝影器材，西尾靜夫後來在資生堂附近的府中街轉角店面開設西尾商店，為後來城內眾多攝影社和照相器材店的先聲，其子西尾善積則走向畫家之路。町名重劃後此店屋位於本町一丁目，目前尚未被拆除而被增建，使用者金石堂書店也己成為城市的共同記憶地標，雖然外牆被塗刷成灰白色，三樓圓弧形的山牆亦已不存，但一樓具歐陸風情的騎樓拱廊保存完好。

臺北城內由於採取街區統一設計，故能實行全盤規劃的手法，以各自不同的店屋表情構成和諧的街道立面，達到市街風貌的一體化，但也有如畫家石川欽一郎在1935年於《臺灣時報》發表〈臺灣風光的回想〉一文，認為一味強調西洋風格的現代化，造成臺灣傳統風貌特色消逝的慨歎。

在臺北城內這些規格尺度皆相近的標準店屋行列中，偶有出現高塔、穹頂或樓層較高者表達建築自明性，增添天際線變化的作品，位於館前路府後街三丁目（後為表町一丁目），由板橋林家出資興建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臺北出張所（圖29）即為其例，不但四層樓高於鄰屋，衛塔上各有一相當醒目的圓

窗，磚石相間的紅白帶飾也較為粗壯，具有德國式的厚重感，中段內凹陽臺可供觀景，整體具有官式建築的氣派，與大街北端起頭的臺灣鐵道飯店相互輝映。

會出現這樣的超規格作品，反映臺灣資本家響應市區改正政策共襄盛舉，有搶先做為示範



圖29 臺北表町通林本源製糖會社臺北出張所，現為館前路合作金庫總行大樓



圖30 大溪老街山牆泥塑裝飾繁複，還有運用剪黏技術增添華麗程度，為本土匠師的獨創發揮



圖31 旗山老街石砌拱廊獨步臺灣，在日本亦屬罕見

的意味，再者將特許成立的本土企業會社置於各種慶典和皇族來訪的奉迎行列必經道路旁，也有展示企業與官方關係，及將雄厚資本具體化的象徵意涵。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在二林事件之後被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此樓曾經出租給柴田自動車商會，兩個圓窗也頗為符合車輪意象。戰後由接收日產「臺灣產業金庫」的臺灣省合作金庫拆除改建為略帶裝飾藝術風格的現代建築，後再改建為現況的合作金庫總行大樓。

幾年間隨著產業發展商業繁盛，這種西洋表情、東洋空間的牌樓式店屋受到法令規制的推廣及各地匠師的模仿，成為遍佈臺灣鄉鎮的尋常風景，也成為今日各地「老街」的基本面貌。而臺灣匠師的學習及自我發展能力極強，樣式及風格潮流雖由日本官方營繕部門帶領，但在各地都發展出帶有自身特色的獨特面貌。

如大溪老街類似西班牙銀匠式巴洛克風格的繁複山牆(圖30)、旗山老街如瑞士伯恩般的石砌拱廊(圖31)等，在臺北本島人聚居、各國商賈雲集的大稻埕，甚至能看到其裝飾繁複程度可與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旁，北方文藝復興後的法蘭德斯地方風格類比

的作品，可見從前臺灣業主眼界和工匠手藝的文化養份接受路徑，或許不能純粹從殖民宗主國單方面輸入現代化資訊的角度讀取，大航海時代遺緒的全球化商貿網絡可能也是重要的參考角度。

1940年代以後，在建築風潮流行、材料與構造法演進、戰爭時期物資管制等條件影響，西方歷史主義的官廳逐漸捨棄以視覺訴求象徵的形式表現，歐洲以樣式反映建築機能的十九世紀傳統，也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臺灣走入尾聲，國家的治理意志，越來越難從官方建築風格輕易感受。

今日在走訪臺灣各地民間豪門大族的洋樓宅邸，仍不時會耳聞鄰里謠傳某某大宅「和總督府是同一位建築師」或「和總督府用同樣的材料」，其實官方技師為民間設計作品的機會極少，但可將此現象視為社會對於日本時代公共營造的崇拜和信心。而今日所謂的豪宅華廈，已不再會看到建商以「和某某公家機關辦公室為同樣建築師或營造廠」這樣的房地產宣傳詞句，不同時代對於官方營造評價的社會氛圍，見證現代化過程社會心理狀態的轉變，這是展覽內容難以直白呈現，卻以城市風貌變化為基礎的真實狀態。

